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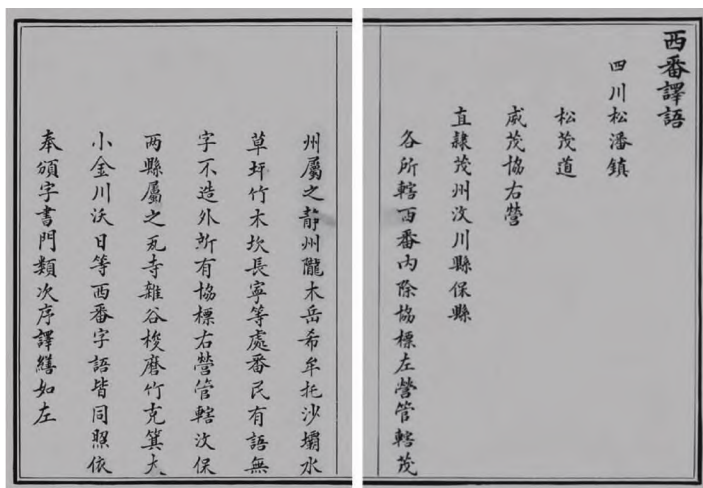
四川省有丰富的语言资源，除汉语外，还有诸多少数民族语言。根据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（第2版）中的《四川省少数民族语言》地图，四川共有少数民族语言19种。其中，藏缅语族语言（通常简称为“藏缅语”）17种，苗瑶语族语言1种，混合语言1种。诸多学者对四川民族语言进行了大量调查和深入研究，积累了丰富的语言资料和学术成果。而在当代学术成果之外，清代、民国时期，官方和民间还搜集整理了一系列藏缅语资料，清乾隆年间四川编纂的《西番译语》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种。

据《清实录》记载，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皇帝圣谕：“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，虽分类音译名物，朕所识者，西番一种，已不无讹缺。既有成编，宜广为搜辑，加之核正。悉准考西番书例，分门别类，汇为全书。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，于咸安宫就近查办，其暹罗、百夷、缅甸、八百、回回、高昌等书，著交与该国附近省分之督抚，令其采集补正。此外，如海外诸夷并苗疆等处，有各成书体者，一并访录，亦照西番体例，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，缮写进呈，交馆勘校，以昭同文盛治。著傅恒、陈大受、那延泰总理其事。”

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四川总督策楞上奏曰：“遵旨采集番书……遵照四译馆西番书例，注明音义，就其同者合之，异者分之，统辖之道府厅州县并部落土司，载明



故宫藏《西番译语》（清抄本，封面题签为“川番译语”）



《西番译语·嘉绒译语》卷首序言（清抄本）

卷首，以备稽考，计共十一本，谨缮写进呈。”四川编纂译语文献十一部，其中九部为记录川西藏缅语者，统称《西番译语》，另外两部记录彝语。《西番译语》所涵括的九部书中，记录藏语的有《松潘译语》等五种，记录尔苏语的有《多续译语》等两种，还有记录嘉绒语的《嘉绒译语》、记录白马语的《白马译语》。

《西番译语》主要有两个版本：一是初编本，即四川上交朝廷的本子；一是清代内务府抄本。初编本有的现存日本，有的不知所踪；清抄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（2018年故宫出版社影印出版）。《西番译语》体例严格按照乾隆皇帝所要求的“照西番体例，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”，参照明代编纂的《西番馆译语》，设“天文”“地理”“时令”等20个门类，共收740个词语，由藏文、汉语词条和汉字注音三部分组成。藏文的性质，可分为两类：如果译语记录的是藏语，则藏文一般使用规范正字；如果译语记录的不是藏语而是其他语言（《栗苏译语》除外），则藏文字母就如同拼音字母一样，仅作为注音符号使用。如此一来，每个汉语词条就会有藏文和汉字两类注音材料。以记录四川冕宁多续语的《多续译语》为例：天文门“日”，对应藏文 ne ma（藏文的拉丁转写，下同），汉字注音为“乃麻”；“月”，对应藏文 lam ma，汉字注音为“良麻”。由于藏文字母和汉字均用来给多续语注音，因此藏汉文字原则上会有语音的一致性。从上述两个例子中，我们也可以窥见藏汉文字的对音关系。

（下转封三）

(上接封二)

作为一套清代编纂的双语辞书,《西番译语》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,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审视和挖掘其学术价值。

第一,《西番译语》编纂于乾隆年间,为我们了解两三百年来川西藏缅语的共时面貌提供了重要参考;如果将译语记录的清代语料与现代民族语资料进行比较研究,便可以认识这些语言历时演变的某些规律。

第二,译语用汉字给民族语注音,汉字注音跟它记录的民族语音之间具有一致性,而部分译语中,藏文也是单纯的注音符号,这种情况下汉字注音跟藏文之间也有对音关系,参考民族语音或藏文注音,便可以了解到注音汉字自身的方音特点。例如:《嘉绒译语》中有“香: ki mo snam—各莫郎”“印: la sang kha—那色卡”之类的材料,“郎”“那”分别对应藏文 snam、la,体现出汉字读音鼻边音相混的特点。根据目前的研究,汉字注音应以当时的四川官话为基础,故我们还可据此研究清代四川方音。

第三,部分译语藏文只承担注音功能,不同藏语方言中藏文字母的读音有差异,因此藏文注音也以某一个具体的藏语方言为基础,运用译语对音资料,可以考察藏文注音的基础方言及其历史语音面貌。

以上三点也是我们近年来研究的重点方向。民族语音方面我们已发表《嘉戎语东部方言的元音对应及其历史演变》等论文;汉语方音方面发表了《〈多续译语〉藏汉对音与清前期四川方音》《〈栗苏译语〉所反映的清前期四川官话音系特点》等文章;藏文注音方面已经发表了《清代〈西番译语〉记音式藏文对藏语历史语音研究的价值》《清代〈嘉绒译语〉藏文注音的规律和性质》等一系列论文。

除了上述三点之外,还应该注重三个方面的工作。一是文献整理。这是译语研究的基础性工作,部分译语初编本尚待搜集,部分译语文本尚待校勘,这是我们目前正在重点推进的工作。二是语言考辨。孙宏开先生早在1989年就发表长文《西番译语考辨》,基本确定了每种译语所记录的语言和方言分支,但个别译语采集的具体方言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。我们团队近年来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,也开展了一些讨论,发表了《〈西番译语〉(川五)所记尔苏语方言考——兼谈确定译语所记语言和方言的方法》等文章。三是田野调查。我们已经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、冕宁县,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,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、汶川县、理县,雅安市石棉县等地,开展多次针对《西番译语》的专题田野调查,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直接参考资料。

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学界认可。全国社科办语言学学科调研组编写的《语言学新视野》(商务印书馆,2021)一书中介绍了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,并指出“这样的研究要求研究者须懂得汉藏系两种以上语言文字,具备汉语音韵学素养和历史语言学理论知识,处于民族语言学研究的高地”。这是对我们的鼓励,更是鞭策。

2022年4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》,强调了古籍工作的重要意义,明确要求“推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”与“整理研究”,这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。《西番译语》正是记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珍贵古籍,是汉语汉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“双语双文”“合璧”的文献,非常值得进一步认真整理和深入研究,而且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古籍工作的背景下,在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》的指引下,这项工作恰逢其时。

(作者简介:王振,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

*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“绝学”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“清代民国中西方珍稀文献中的川西藏缅语资料集成与研究”(编号:19VJX088)的阶段性成果。



笔者(中)在冕宁县开展《多续译语》专题调研



《西番译语》研究交流(左为尔苏语研究专家王德和教授,中为笔者,右为法国科学研究院东方语言研究所齐卡佳教授)